

京城周末徒步族

·焦晶娴·



5月前,每周末,北京都有100辆以上的大巴车驶向怀柔、门头沟和延庆等山区,车上人的年龄多在20岁到40岁之间。他们将要将在没有台阶的碎石路上、狭窄的悬崖峭壁间,完成5公里以上路程和500米以上的爬升,然而有些人工作日的步数不超过3000步。走向大山的理由各不相同,他们用“极致虐,极致美”“痛苦并快乐着”描述这项活动。

孤独

周末清晨,北京10号线西段的公主坟站,北段的牡丹园站、北土城站都是徒步俱乐部的重要聚集点,一出站就能看到十几辆50座的大巴车,从一个路口排到另一个。这些大巴车每周拉的人都不重样,车上人的年龄、职业、性格也各不相同。据领队们观察,有半数人都是独自前来。

若不是徒步活动,27岁的程序员卢雨薇很少主动走入人群。她喜欢一个人参加这种徒步活动。在熟人多的地方,她怕尴尬,总要不停地说话。但在这里,她可以自由地融入人群,而不用榨干自己的情绪。早些时候,老户外间流传着“户外三不问”的规则:不问职业、不问收入、不问家庭。

现在,有的俱乐部为了破

冰,会让大家在大巴车上做自我介绍。有性格开朗的,会拿着蓝牙音箱唱口水歌,说相声、讲脱口秀;也有一心工作的,详细介绍业务范围,静等同行或者客户抛来橄榄枝;也有人交友需求,有意无意介绍自己“单身”,在群里用玩笑口吻给自己打一波广告。

如果说车上的社交还带着目的性,从下车的那一刻开始,这些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会因为原始本能聚在一起。

一位40岁出头的金融男爱上了徒步的这份自在。同龄人都有了家庭和孩子,他的周末总是一个人,喝酒撸串。现在能和一群人一起做些什么,“至少有个地儿能去,也是给了我一个归属”。

自由

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京郊徒步的火爆。“北京徒步

者”的创始人张大鹅粗略估计,目前北京至少有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的徒步俱乐部。

北京徒步运动的发展有天然优势。北京一半都是山,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有200多个,距离相近的高峰排列组合,就能诞生出无数错综复杂的线路。怀柔、门头沟、延庆这些在旧时是抵御外敌的战略防线,在今天却成为城市居民精神的泄洪地。

39岁的黄玲原本从事出境旅行行业,疫情改变了一切,她开始直面收入落差和社交重建。

“徒步帮我打开了一扇新的门。”她以前练过瑜伽,也去过健身房,但觉得“没有趣味”“纯粹靠意志力”,目光所及之处色彩单调、沉闷。之前她也经常带着孩子们旅行,一下飞机就住进酒店和民宿,“不过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”。徒步过程中,风景是流动的,一举一动也纯粹遵从身体,没有时间的概念,也没有必须遵从的计划表。

黄玲现在的目标是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,她会主动组织客户和同事一起户外徒步,大山成了她社交的舞台。

出路

北京一家针对中年群体的徒步俱乐部创始人介绍,他们主要的客户包括律师、金融从业者、公务员和国企高管,“城市里大家面对的压力特别大,走到户外,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,也是更深层次精神压力的释放。”

在徒步者的队伍中,有一群全职宝妈,会避开周末,在周中的某一天挤出时间参加活动。她们是家庭的中流砥柱,在孩子、丈夫和老人跟前随叫随到,但在山里的几个小时,她们“不需要惦记任何一个人”。

在开始徒步之前,赵丹所有的生活重心都在女儿身上。她婚后就再没工作,“被需要”是她生活最大的动力。前年女儿入学一所国外大学,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在家上网课,她整宿熬夜陪着女儿上网课,作息颠倒。去年女儿出国继续学业,赵丹才发现身体和精神都出走了太久,“找不到自己”。

为了摆脱这种状态,现在她每周都至少爬一次山,每次爬山就像是奔赴一场盛大的约会。收拾第二天的背包是一种

回归

在社交媒体上,徒步更多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贩卖给“卷”在工作里的都市白领。

据张大鹅介绍,“汪汪队”是他们今年开辟的一个新玩法,10组就能发一辆大巴,每排坐一位主人和一条狗。“他们来不是为了自己玩,是为了让狗子玩一玩,让狗有一个社交,狗就是他们的家庭成员。”

但当周末结束,无论为何出发,他们总要回归波澜不惊的生活。

去年刚参加徒步时,卢雨薇刚从一家创业公司跳槽到大厂。创业公司曾经连续3个月搞封闭开发,一天没休息过,每天加班到凌晨。跳到大厂后,她傍晚下班看到对面大楼还亮着灯,心中说不出的焦虑。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,“只是躺着就会觉得心里空虚”。为了找到新的兴奋点,她先是逛遍了北京的公园,之后开始在网上搜索北京周末户外活动,看到不少关于徒步的帖子。第一次参加徒步,爬升高度1000米,她爬完屁股痛了好几天,但享受到了“自虐的充实”。(除黄玲外,其他受访者均为化名) (摘自5月1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离开北上广,把成都“卷”起来的互联网人过得巴适吗?

落差

“我来成都的时候,想要的可不是这种生活。”两年前,为了彻底逃离北京的种种不如意,陈徐言决心在成都“过上最好的生活”——在市中心买套130平起步的新房子、找份不用加班的工作、空了就扎进茶馆、“摆摆龙门阵(四川方言、指聊天)”。

两年后,她的大部分愿望都落空了:满意的房子超出预算,几个“次优选”还没摇号,她只好一直租房住。“巴适”的生活更是别想了。记者在成都一家创业咖啡馆见到陈徐言时,她因跟投资人谈判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。采访匆匆结束后,她又端着半杯咖啡快步赶回公司加班。

过去十年间,成都展现出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。自2017年实施“人才新政”以来,平均每天约500人落户成都。从2019年起,在新一线城市中,成都人口增量仅次于杭州。去年成都更成为全国最热门迁入地,人口一年净增20万以上。在落户

来源地中,北京、上海、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、第28位、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、第18位和第4位。

这座城市将自己打造成安逸、幸福与文艺的代名词,精准击中了在北上广过着“996”生活的打工人。在“海内外to成都”社群,70%-80%成员来自互联网与金融行业。加班严重、在一线买不起房、无法定居和对生活质量不满意是他们移居成都的主要原因。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,除了落户政策与房价友好,成都还承接了互联网的中西部产业。

很多案例表明,“拿着北上广的薪资,过着成都的生活”在现阶段实现的机会很小。

两个成都

自小在成都长大的互联网创业者Kevin认为,典型的老成都人靠拆迁和做买卖发财起家,只求一份稳定、不忙的工作,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生活。而这样的生活“只在二环里有”。

迁徙成都的人,基本上在

来源地中,北京、上海、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、第28位、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、第18位和第4位。

这座城



成都老城区风貌

高新区定居。这里不像成都,更像是北上广的复刻版。“成都分为两座城,高新区和其他区。”成都市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脱口便是这句话。

仅看一家公司开在二环,还是高新区,即可判断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传统的“855”还是互联网行业的“996”。“晚上往高新区那边走,地铁坐到最后两站,就像是在北京天通苑一样,都是刚刚下班的人。”

与遍地茶馆、棋牌室和KTV的老城区不同,高新区只有众多钢筋水泥浇筑的大厦。这里遍布着咖啡店、便利店、快餐店,许多餐饮店口味变得没那么油和辣,适应外地打工人的需求。

把成都卷起来

北上广人的迁徙潮带动了成都的改变。2012年前后,张正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:“成都人加班,比较散漫。”一些知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,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

到北京。总部不迁出成都,对方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为了抵御风险,许多公司设立双总部,将研发或产品总部放在成都,将市场总部放在北上广。许多人在来成都前,已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,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式已内化于心。迁徙潮发生10年后,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业习惯,逐步向北上广靠拢。

“太多人涌入成都了”,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言。同样受“安逸”吸引来到成

都后,他赶上的却是同事“往死里”加班——许多人还保持着华为的工作习惯。

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长,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。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,清北毕业、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。

张正刚认为,产业迁移仍非根本,核心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。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还将持续。北上广留不住,家乡小城市回不去,“彰显了成都的独特价值”。(除张正刚、Kevin外,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)

(摘自5月17日财经网 王雨娟 王莘莘文)

配合防控 人人有责



出现发热、干咳等症状,及时就医,并主动向社区报告
发现抗原自测阳性,主动向社区报告

中宣部宣教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



扫我有惊喜